

第三章 鄧小平時代的來臨(1976-1982)

在毛死後至十二大的中共派系衝突可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四人幫、華國鋒及老幹部的派系鬥爭，第二個階段是實踐派與凡是派的鬥爭。

派系衝突大致可以分為幾類：(一)政策面向所致的派系衝突，(二)意識型態面向所致的派系衝突，(三)權力面向的派系衝突。¹而中共黨內派系衝突都混合這幾種面向，但混合的比例則視時期而定。

本章派系鬥爭第一個階段是四人幫、華國鋒及老幹部的派系鬥爭，這波衝突的主要層面是權力的鬥爭。而在第二階段則是實踐派與凡是派的派系衝突，衝突的議題則比較廣泛，以權力為主，但在意識型態、政策各層面也有討論。經過了這兩波派系衝突，鄧小平成功地奠定了其權力基礎，其權力雖不能與毛澤東相比，但也已相當穩固，登上了派系的制高點。

第一節 派系概況及衝突點

本章派系鬥爭第一個階段是四人幫、華國鋒及老幹部的派系鬥爭，這波衝突的議題只有一個，毛死後的政權由誰接掌？

在毛澤東死後這段時間，中共權力接班陷入混亂，華國鋒、老幹部與四人幫的衝突，明顯地權力鬥爭的成份占了最多。華國鋒和四人幫雙方面的主要衝突點在於毛的遺囑到底是要誰接班？四人幫在毛死後掌握著媒體宣傳機器，主要媒體仍充斥著文革式的語言，把目標對向華國鋒，例如 1976 年 10 月 4 日，在一篇署名梁效所寫，「永遠按既定方針辦」的文章：「毛主席按既定方針的囑咐金光閃閃，字字萬鈞」，「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針，就是背叛馬克思主義，背叛社會主義，背叛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偉大學說」，「任何修正主義頭子膽敢篡改毛主席的

¹ 張五岳，《中共派系衝突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碩士論文(1986)，頁 69-109。

既定方針，是絕對沒有好下場的。²四人幫的文章沒有點名，但我們可以看出他們是把矛頭對準了華國鋒，種種的跡象顯示了四人幫欲鏟除華國鋒成為中國大陸最高領導的意圖。四人幫利用其掌握的宣傳機器否定華國鋒接班的正當性，宣稱自己才是毛澤東欽點的接班人。

華國鋒為首的文革受益派在意識型態及政策上，我們看不出和四人幫的不同，但在權力上的衝突則是顯而易見，在四人幫殺氣騰騰地表達了不願和華國鋒一派共享權力的企圖後，雙方的鬥爭變成了贏者全拿，敗者全輸的零和遊戲，四人幫在文革時的鬥爭，是將其政敵趕盡殺絕，因此華國鋒派勢必只得和四人幫硬碰硬。

而以葉劍英為首的老幹部則早已忍受四人幫多時，在文革時老幹部多多少少都受過四人幫的迫害，就算本人沒有遭受過羞辱，但是看到革命同志、老友的情形，對四人幫有極大的惡感。聶榮臻於毛死後則常和華國鋒交換意見，其他老幹部也都有相同看法，認為四人幫會有可能把鄧小平殺害，軟禁葉劍英等行為，以確保四人幫的權力不會受到老幹部們的威脅，且認為不應用正常黨內的鬥爭途徑，而是必須先下手為強，以軍警力量處理四人幫問題。³華國鋒派和四人幫比較，顯得相對的溫和及理性，因此依據聯合次要敵人對抗主要敵人的權力鬥爭法則，老幹部選擇支持華國鋒派，支持華國鋒派以軍警力量逮捕四人幫的決策。

而在四人幫和華國鋒派的矛盾激化之後，老幹部和華國鋒派便決定聯手以政變手段將四人幫逮捕，整個過程由華國鋒派的汪東興組織執行，沒有遭到四人幫激烈的反抗。

而在第二階段則是實踐派與凡是派的派系衝突，這波鬥爭混合了權力、意識型態、政策三個層面，衝突的議題有(1)鄧小平該不該復出？鄧小平的地位應該是如何？(2)對文革的評價，文革到底應給予正面評價或負面評價？(3)要怎樣解讀毛澤東思想？(4)經濟政策是要延續毛澤東的作法，或是進行改革？

² 梁效，「永遠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針辦」，光明日報，1976年10月4日，第1版。

³ 聶榮臻，《聶榮臻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4），頁867。

實踐派與凡是派的衝突過程在本章第四節有詳述，在此本文先做一些釐清，對文革的評價與對毛澤東思想的解讀，表面看起來是意識型態之爭，但實質卻是權力的鬥爭，因為這兩個爭端的結論，將決定鄧能不能復出，及復出後，鄧的地位可以到達怎樣的程度？而實踐派巧妙的解釋毛澤東思想，使鄧小平得以在復出後能順利地登上大位。

而老幹部在這階段，當然對華國鋒派所提「兩個凡是」及對文革的評價有意見，但本文也認為，老幹部們和鄧的私人情誼更加強了老幹部們對實踐派的支持，在實踐派理論建構及論述完成後，老幹部表態給予認同，鄧小平終於在十一屆三中全會登上中國大陸最高領導人的大位。

表三之一 四人幫、華國鋒爭權時期的中共派系及其主張

	四人幫	華國鋒派	老幹部
代表人物	江青 張春橋 姚文元 王洪文 毛遠新	華國鋒 汪東興 陳錫聯 紀登奎 吳德	葉劍英 李先念 聶榮臻 鄧小平
毛死後由誰接班？	偽造毛澤東遺囑，企圖掌權的野心十分明顯，並運用其掌握的宣傳機器攻擊華國鋒。	華國鋒自認為是毛澤東欽點的接班人，手握毛澤東親筆「你辦事，我放心」的小紙條。	毛澤東生前不信任老幹部能執行其意志，因此老幹部們不具接班資格；對華國鋒派有相對好感，因此支持華國鋒接班。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表三之二 實踐派與凡是派爭權時期的中共派系及其主張

	實踐派	凡是派	老幹部
代表人物	鄧小平 胡耀邦	華國鋒 汪東興 陳錫聯 紀登奎 吳德	葉劍英 李先念 陳雲 羅瑞卿 王震
鄧小平該不該復出？	應該。	鄧小平不得復出的決議是毛澤東定的，根據「兩個凡是」，鄧不得復出。	基於私人情誼及對鄧能力的肯定，認為鄧小平應該復出。
對文革的評價為何？	錯誤。	四人幫之過是其欲篡位奪權，文革是正確的，有必要時要再發起文革。	錯誤。
如何解讀毛思想？	毛思想重點是「實踐是實現真理的唯一標準」，毛澤東的言論不等於真理	「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擁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的遵循」	支持實踐派的論點。
經濟政策應否延續？	必須改革，調整資源配置，改善人民生活。	延續毛澤東重重輕輕的策略。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	沒有特殊主張，陳雲在鄧掌權後被授權處理經濟問題。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第二節 經濟危機：洋躍進的侷限

在毛死後至十二大這段期間，大陸的經濟政策可分為兩個階段，一個是華國鋒的洋躍進，一個是由陳雲主導的「調整」。

在文革十年中，除了 1966 至 1969 年，因為武鬥、紅衛兵串連等因素，造成工廠停止運作，運輸交通系統因為要載運紅衛兵到處串連而癱瘓等情形，在這三年中整個工業產量是下降。在文革十年中，基本上工業產值是緩慢增加的，在被認為最混亂的第三個五年計劃期間(1966-1970 年)，國民生產總產量的年均成長率仍有 6%，國民所得成長率也有 8.4%，⁴這時的經濟發展策略仍是走傳統史大林重重輕輕模式。文革帶給中國大陸經濟的最大影響，事實上是在這段期間，計劃決定者不敢有太多的意見，只能因循苟且地照原有模式繼續發展經濟，50 年代制定的工業策略，在 60 年代後期和 70 年代初期未發生重大的變化。

在大躍進之前，其實中共已經看出蘇聯模式在中國大陸適用的瓶頸，因此後來才有毛澤東所用以群眾運動發展經濟的方式，結局如我們所知，是造成一場空前的災難，實踐結果是破產的。毛下野後，由劉少奇、陳雲、鄧小平主導經濟決策權，提出了包括三自一包的政策，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雖仍是計劃經濟，但改變了資源配置，取代原有重重輕輕模式，在市場機制的部分也給予部分的容忍。⁵但在文革後，毛重新掌權，經濟發展策略又回到傳統的史達林模式。

史達林模式的基本特徵，就是重視重工業、輕視輕工業；重積累、輕消費，因此國民生活水準無法隨經濟成長提升。⁶毛澤東死後，文革結束，人民生活普遍沒有改善，加上大大小小由政府發起的政治運動，人民已經厭倦這種生活，共產黨的統治正當性已遭到挑戰，毛尚未死亡前，已出現了第一次天安門事件，人

⁴ 殷一昌，「從歷史觀點看經濟調整」，《第十一屆中美中國大陸問題研討會專輯》(台北：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1982)，頁 9-10。

⁵ 吳玉山，《遠離社會主義》(台北：正中書局，1996)，頁 62-63。

⁶ 林毅夫、蔡昉、李周，《中國經濟改革與發展》(台北：聯經，2000)，頁 57。

民藉由弔唁周恩來，來抒發對當時中共領導人的不滿，統治正當性已遭到質疑。

毛死後，經過和四人幫的鬥爭，由華國鋒掌中共大權，一方面可能由於華國鋒對經濟沒有什麼概念，思想僵化；一方面則是其執政合法性來自於毛的「你辦事，我放心」的紙條，不敢有所突破，華國鋒的經濟政策繼續維持史達林模式的準則，他重新提出「十年規劃」，將大量的資源投資在重工業發展之上，並且向國外大量購買生產設備，稱之為洋躍進。

如前所述，這種寄望用大規模投資重工業來刺激經濟成長的經濟政策早在 50 年代就遇到瓶頸，此種模式，雖然重工業發展，但是投資回收緩慢，並對其他經濟部門的資金產生排擠作用，且重工業對一般人民生活助益不大，蘇聯模式應用在中國大陸是有問題的，⁷這是中共早就知道的。

在 1978 年，華國鋒政權的經濟政策開始面臨危機，其推動的一千多個計劃已經很難達成，已超過其投資能力的範圍；在下半年又在洋躍進的風潮下大量追加投資。華國鋒統治了兩年，在經濟上的表現是失敗的，人民生活並沒有得到改善。

在年底十一屆三中全會後，華國鋒失勢，開始由鄧小平掌權，經濟發展策略也開始轉變。鄧小平在經濟方面，交由陳雲主導，陳雲是中共領導人中最富財經長才其中之一，重視財經工作，國共內戰末期，其接收瀋陽、東北各大城的經驗，樹立了中共接受城市的樣板，中共建政後，陳雲可說是財經工作的第一把手，後在大躍進毛澤東頭腦發燙時，陳雲則是稱病休養，大躍進失敗後再度出來主持中央財經小組，提出「調整、鞏固、充實、提高」八字分針，號稱是「調整大師」⁸，並支持包產到戶，有效地解決了當時的經濟危機。陳雲也是中共 50 年代整個蘇聯統制式經濟結構的建構者，除了在農業部門，他容許有少許的市場機制，但在工商部門，基本上他是計劃經濟的支持者。自 1979 年開始，鄧小平掌權，並

⁷ 費正清編，《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1949-1965)》(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頁 315-323。

⁸ 葉永烈，《陳雲全傳》(台北：周知文化，1995)，頁 168-183。

且將經濟政策授權給陳雲負責，兩人合作調整華國鋒的經濟發展策略。

以鄧小平為首的新當權派一方面為了消除中共政權的合法性危機，也或許是他們真心以人民福祉為己任，他們積極地想要改善人民的物質生活。要改善人民的生活自然得從農業和輕工業著手，傳統史達林模式的重積累、輕消費和重視重工業、輕視輕工業的資源配置型態開始改變。在這個背景之下，陳雲在 1979 年春天提出了「調整」的主張。接下來在 4 月的中央工作會議當中「調整」被採納為指導經濟發展的原則，同時擴大成「調整、改革、整頓、提高」的八字分針，宣示了當前的四項基本任務，而以「調整」居首位，決定在三年內的時間完成。⁹這個八字分針和 1960 年夏天在大躍進失敗後，中共提出的「調整、充實、整頓、提高」如出一轍，都是在追求不切實際的高積累、高成長失敗後所被迫採取的政策，且都是由陳雲所主導。

我們可以看出陳雲為首的經濟官僚，其追求穩定的基本主張在 60 年代初和 1979 年是一致的，以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在計劃經濟的結構下，調整國家資源的配置。調整的重點在改正經濟各部門的比例關係，要使農產品的增長速度能夠配合人口成長和工業需要，使輕工業的成長速度趕上重工業的成長速度，同時強調要增加消費，降低積累，壓縮基建規模，反映了陳雲的一貫主張。

陳雲在 1979 年開始積極推動裁減中大型的基建項目，減少向外國貸款與採購成套的機器設備，並要求對農業和輕工業投注更多的資源來改善人民的生活水準，但是受到當時左派勢力的阻撓。當時在經濟政策上，左派的力量集中在以余秋里為首的石油派身上，余秋里當時擔任國家計劃委員會主任。余秋里認為把正在進行中的基建項目緩建會帶來很大的損失，但在 1979 年 11 月，發生「渤海二號事件」，由陳雲派的姚依林接掌該職位，陳雲在經濟決策上的地位鞏固。¹⁰並且透過對於「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的批判，陳雲、鄧小平在經濟政策取得主導權。

⁹ Dorothy J. Solinger, "The Fifth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and the Process of Policy Making: Reform, Readjustment, and the Opposition," *Asian Survey*, vol. 22, no. 12 (1982), pp. 1238-1275.

¹⁰ 吳玉山，《遠離社會主義》，頁 67。

1979 和 1980 年兩年「調整」進行地並不順利，因為華國鋒的十年規劃造成了固定資產投資的大量增加，財政赤字擴大，通貨膨脹的情形開始顯現。有限地「調整」無法解決這些問題，在 1981 年，他們要求透過行政命令來強力削減政府和企業的支出。結果在 1981 年結束，調整的策略創造了很好的成績，尤其在改善部門比例關係和平衡貿易逆差方面，輕工業年增長越來越快，重工業的產量也逐步下降，出國也逐年增長。¹¹另外，大陸也決定加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並且決定開放市場，並設立特區，中國的體系不再是封閉的。

在十二大所提出的經濟政策，仍是以陳雲主導，以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相對於計劃而言，市場扮演的是次要和補充的角色。對陳雲而言，計劃就像是鳥籠，籠子的範圍可大可小，鳥在鳥籠內可自由飛翔，但重點是，鳥還是在鳥籠裡，這就是所謂的「鳥籠理論」。在此基調下，中國大陸的經濟穩定地發展。

根據第二章所提到，經濟的危機表示政策出問題，或是政策不能因應時勢，政權必須重新討論政策，因此在制定政策過程中，可能將出現不同意見，進而影響團結；且政策討論可能也會從經濟政策，擴散到其他社會政策，甚至是政治議題。

但在毛死後自十二大這段期間內，派系衝突基本上還是以權力鬥爭為主，政策之爭處於次要的地位，實踐派與凡是派在經濟政策的主張有所不同，但並不是爭論的重點，經濟政策基本上沒有派系間的辯論、衝突。實踐派與凡是派的攻防主戰場還是在意識型態及毛思想的解讀。

¹¹ 同前註，頁 68。

第三節 政治動員：北京之春

毛死後，華國鋒憑著毛澤東一張「你辦事，我放心」的紙條取得了黨政軍的大權，和老幹部合作將四人幫趕下台，但隨著四人幫垮台後，兩派產生了矛盾，擁有完整資歷、豐沛人脈及無人匹敵聲望的鄧小平趁機復出(1977年夏)，成為老幹部的群龍之首，但鄧此時仍保證對華的效忠，因為意識型態仍為華國鋒所掌控。

華國鋒以「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擁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的遵循」¹²及那張小紙條作為其統治的正當性，鄧知道，只要將「兩個凡是」推翻，華國鋒統治權力的基礎也就瓦解。趁著華國鋒於1978年5月到北韓訪問時，胡耀邦提倡「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也是毛的話，那麼華的「兩個凡是」便是錯的，「實事求是」的主張獲得黨內普遍的支持，鄧小平眼見水到渠成，於1978年底取得大權。

在這背景下，1978年9月出現了「北京之春」，一些青年知識份子在西單民主牆張貼大字報暢所欲言，甚至發表官方不樂見的言論，討論官方不願意討論的議題，鄧小平及其支持者最初反應是有意縱容，因為一些對文革的批判反省，對其和華國鋒的鬥爭是有利的，可用來對抗華的「兩個凡是」主張。

鄧小平在毛死後復出，最初主管科研和教育工作。他為知識份子平反並改善其物質生活。由於國家的財力有限，鄧小平所帶來的物質生活改善並不是很多，但是不再視知識份子為「臭老九」，而是視為「腦力勞動者」，是勞動階級；不再是「團結、教育、改造」的對象，而是可放手任用的國家資產。中共中央宣傳部門也採取比較開放的政策，開放禁書、禁戲，讓文藝界批評。這些開明作法贏得了知識份子的好感。¹³

就在這種政治氣氛中，一些青年知識份子利用毛澤東所主張的四大自由，大鳴、大放、大字報和大辯論，發表官方不願看到的言論，也有人開始討論官方不

¹² 人民日報，1977年2月7日，第1版。

¹³ 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台北：聯經，1999)，頁456-460。

願意討論的各種議題，組織官方不願成立的民間社團。

北京長安西路和西單街交會之處，有一道兩公尺高、一百公尺長的寬闊圍牆，北京之春的大字報大多張貼於此，最初大字報多為捧鄧貶華，及要求為天安門事件平反，取消對天安門事件定調的四七決議，這兩個訴求都對在和華國鋒進行權力鬥爭的鄧小平有利，因此鄧小平也樂觀其成，並發表肯定、支持的言論，於是民主牆的大字報越來越多，言論也越來越大膽。

但 1978 年底西單民主牆的大字報運動開始狂飆，貶毛大字報有走向反共大字報的趨勢。例如 11 月 22 日的一張大字報，其結論是「如果對毛主席沒有正確的了解，言論自由就只是空談。現在應該是中國人民起來掙脫一切意識型態束縛的時候了。」24 日啟蒙社的大字報激烈地陳述：「起來吧！中國人！是時候了，是向一切專制者、獨裁者進攻的時候了。我們要給他們最後的審判，徹底清算他們。」又有一張大字報寫著：「我們不能忍受人權與民主僅是屬於西方資本主義的口號，而東方的無產階級似乎只是需要獨裁，包括對社會上層建築的每一範圍的全面絕對控制。」這些大字報不但貶毛而且貶共，貶共之餘還要反共，也因此引起中共中央的注意。¹⁴隨著批毛、反文革、反共產的大字報出現，鄧小平不敢坐視情勢自然發展，開始要求各級黨委善於引導，多作思想教育。此後，中共報刊言論隨之一變，由鼓勵、慫恿大字報，轉為溫和的批評，及強調安定團結，集中搞四化。

鄧起初對北京之春有意縱容，青年知識份子卻誤以為時代已經改變，越來越大膽，要求民主的聲音引起外國的注意，一些人甚至提出反對無產階級專政的言論。鄧此時正在美國訪問，聲勢如日中天，回國後認為北京之春的言論及活動已超出可忍受範圍，於是下令逮捕魏京生等人。1979 年 3 月，提出四個堅持，同年夏天宣佈取消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四大自由，並於 3 月 25 日逮捕魏京生。魏京生 1950 年出生在北平，父母都是中共中級幹部，文革後從事電氣工

¹⁴ 劉勝驥，《北京之春》（台北：幼獅，1986），頁 95-100。

人的職業，1978年12月5日在民主牆貼出「第五個現代化」，認為民主為現代化所必須，魏京生的論證完整具有說服力，並且文字的煽動性很夠，因此中共會將其定為頭號打擊的對象。¹⁵接著又出版《探索》雜誌，鼓吹民主。魏京生遭中共以洩露國家機密給外國為罪名，被判刑15年。事實上，所謂國家機密都是報紙上可以看到的消息。¹⁶曇花一現的北京之春大體結束。除了逮捕魏京生外，四月份又擴大羅織，捕抓民主運動的主要領袖。

鄧為何對北京之春的態度轉變？本文認為主要有兩個原因，第一，北京之春的背景是實踐派與凡是派鬥得最厲害的時候，民主牆初期的言論，多是對文革的反思，包括了替天安門事件申冤，也有公開斥責汪東興、吳德、紀登奎和陳錫聯為「小四人幫」的言論。這顯然地是對實踐派有利的，因此實踐派給予高度肯定，但是當1978年11月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鄧小平地位確定，凡是派潰不成軍之後，北京之春的利用價值也已經沒有了。

第二，當民主牆運動沒有了利用價值，而其言論又越來越過火，從質疑文革、質疑凡是派，變成質疑共產黨、甚至於質疑到鄧小平本人，鄧小平並非真的支持所謂「民主」的價值，之前寬容及鼓勵，是因為它對鬥爭有助益，但當運動失去控制，派系鬥爭又告一個段落，自然開始抑止其繼續發展，以免反噬到鄧小平及整個共產黨的領導。

北京之春因為派系衝突的背景下壯大起來，而在派系衝突有了暫時定局後即被官方宣告終止。可以說民間政治動員被威權政體內部派系鬥爭時當作工具使用，加上民間力量尚未成熟，因此當中共提出四個堅持後，北京之春就迅速地被壓抑下來。但畢竟北京之春已經把威權政體開啟了一個小缺口，這是中共建政後第一個民間自主有組織性的動員，雖然規模不是很大，但具有重要的意義。

¹⁵ 中共問題原始資料編輯委員會，《大陸青年的怒吼》（台北：黎明，1983），頁154-168。

¹⁶ Jurgen Kremb，葉慧芳譯，《魏京生前傳》（台北：捷幼，1998），頁102-110。

第四節 政權內部派系分裂：毛後的政權爭奪戰

本章研究範圍是從 1976 毛死後至 1982 年十二大，毛死後，中共內部大略可分為三派，分別是四人幫、華國鋒為首的文革受益派，及老幹部。四人幫和華國鋒的合法性，都是來自於他們和毛澤東的特殊情誼，四人幫在文革中的所作所為，有時雖被毛譴責，但大致是在貫徹毛的意志，有如毛的家臣，毛澤東的威望，使得被他們惡整的老幹部也莫可奈何；而華國鋒則是被毛澤東拔擢的接班人，華國鋒原本只是個名不見經傳的地方幹部，毛看他忠厚老實，出自內心地遵守毛的路線，無論是政治或經濟或意識型態，都是毛最忠實的追隨者，最後華國鋒竟成了毛死後的最高領導人。

而老幹部則是在民間擁有相當高的威望，在周恩來死後的第一次天安門事件，就可以觀察出四人幫的不得民心，也可以看出毛澤東的威信是在下降的，但老幹部並不受毛澤東青睞，毛死前最擔心的就是文革遭到否定，甚至於毛本人的人格遭到批評，而老幹部的意識型態完全不被毛澤東所信任。

就在這背景之下，毛死後由華國鋒當上最高領導人的大位，但四人幫不將他看在眼里，而華國鋒也覺得四人幫非善類，於是老幹部和四人幫聯手，出其不意地將四人幫逮捕，並未遭到太大抵抗。四人幫的錯誤，是未能和以華為首的文革受益派建立聯盟，他們太得意忘形，他們在上海有很穩固的權力基礎，又掌握了新聞媒體，又是政治局常委，並且與毛澤東關係密切，毛的姪子毛遠新也是四人幫的支持者，但四人幫錯估情勢，等到華國鋒和葉劍英、李先念組成聯盟時，他們已經回天乏術、氣數已盡了。華國鋒除了原有的總理職位，也接下了黨主席和軍委會主席，似乎已經處於無堅不摧的地位。

在四人幫垮台之後，中共黨內生態又起了變化，當時中共黨內大致可分為三派：一是華國鋒為首的文革受益派，二是葉劍英和李先念等中間派，三是以鄧小平為首的老幹部。

葉劍英和李先念兩位元老，對華國鋒並沒有偏見，甚至可能有些好感，在某些層面上，華國鋒當時能居大位，除了毛之外，葉劍英和李先念也算是華國鋒的貴人；但對當時被打倒的鄧小平，葉和李更有著革命情感，一些早期的研究，可能資料有限，有時會從權力衝突來解釋，認為葉劍英可能會較為偏袒華國鋒一派，並不想讓鄧小平復出，但從鄧榕的書來看，「記得為了讓父親第三次復出，葉伯伯讓他的小兒子親自駕車，把還在軟禁中的我的父親偷偷接到他的住處。當時我在場，清清楚楚地記得，他們兩人見面之時，萬分激動，父親長長地叫了一聲『老兄』，兩人的手便緊緊握在了一起。」¹⁷因此葉劍英和李先念在華國鋒和鄧小平的權力鬥爭中，並沒有太多的偏袒。

壹、權力面向的派系衝突

華國鋒在鏟除四人幫後，開始試著鞏固自己的權力，由於他的權力正當性，是來自於毛的指定接班，所以他自然蕭規曹隨，不打算改變毛的路線，並且大樹毛澤東的權威包括建立毛主席紀念堂、發行毛選第五卷等，甚至於自己也模仿起毛澤東的髮型。而緊跟在其後的，是汪東興等。文革受益派感受最大的威脅，就是來自於鄧小平的威脅，鄧小平在周恩來死後接替周的工作，獲得民間相當高的支持，但在第一次天安門事件後，黯然下野，現在毛澤東死亡、四人幫垮台，鄧小平本人當然急欲重出江湖，文革受益派只好運用他們唯一的武器：搬出毛來對付鄧小平，他們不斷地強調，「天安門事件是反革命暴亂，是毛主席定的」；「鄧小平的問題，主席已經有了四號文件，四號文件裡邊，不管怎麼樣是正確的，是毛主席的指示」；「鄧小平這個人是有錯誤的，而且錯誤是嚴重的，他不聽毛主席的，還是搞他過去那套東西」。¹⁸到了後來，直接總結兩句話，「凡是毛主席作出

¹⁷ 鄧榕，《我的父親鄧小平》（香港：三聯，1993），頁 597。

¹⁸ 阮銘，《鄧小平帝國》（台北：時報文化，1992），頁 21。

的決策，我們都堅決擁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的遵循」。¹⁹

用此來鞏固自己的權力，我們可以看出文革受益派的侷限性了，毛不是耶穌基督，在他死後他的威信是在下降的；更何況為了鞏固自己的權力，文革受益派還說要繼續執行毛的繼續革命路線，並且會伺機再進行第二次文化大革命，不管對民間社會或是對黨內非他們派系幹部而言，都是相當反感的。凡是派終究無法抵擋民間和老幹部雙方面的壓力，葉劍英、李先念、陳雲、王震……及許多老幹部都曾發言支持鄧復出，加上鄧並沒有從一開始就直接和華國鋒正面地交鋒，鄧小平先是委屈求全，承認華國鋒的最高領導人地位，以及表達了對毛路線的效忠，儘管凡是派不斷地阻撓，鄧終於還是在 1977 年 7 月恢復了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和軍隊參謀長的職位，主要是負責科教政策，以及平反老幹部的工作，也為鄧小平爭取了更多民間及政權內的支持。²⁰

而如上一個章節所說，民主牆運動一開始對鄧小平十分有利，鄧小平就援引這股民間力量，配合 1978 年 5 月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之發表，在理論上戰勝了「凡是派」，進而在十一屆三中全會登上大位，取得中共黨內實權。

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黨內派系依權力區分，大致可分為幾派，一是陳雲為首的保守派，陳雲在經濟政策及意識型態上較為保守，但權力上並沒有野心，二是胡耀邦、趙紫陽為首的改革派，而鄧小平是居於制高點的平衡者，當某派權力上升時，鄧小平會給予壓抑，讓兩派互相制衡，達到權力的平衡，讓政局穩定。事實上直到 1989 年為止，中共黨內生態就是維持這樣的發展，只是有個趨勢，是無論在政治和經濟方面，都是在「一管就死，一死就放，一放就亂，一亂就管」的循環中，慢慢地變為寬鬆，經濟的寬鬆帶來經濟成長，及漸漸適合中國大陸國情的經濟體制，但當然也會帶來一些經濟亂象，容本文後面篇幅介紹；而政治則是帶來自由化的開啟，市民社會的雛型漸漸出現，尤其學生時有因各種原因所發起的遊行，雖都仍能在政府掌握之中，但也漸漸取得他們的發言權，同樣地，這

¹⁹ 人民日報，1977 年 2 月 7 日，第 1 版。

²⁰ 湯應武，《抉擇 1978 年以來中國改革的歷程》（北京：經濟日報出版社，1998），頁 34-45。

種民間社會自發的行為，是威權政府所不樂見的，因此中共保守派也嘗試壓制此種力量，但從本文研究範圍來看，保守派在這段期間的力量是漸漸下降的，但改革派也在這段時間內，損失了幾位領導人，詳細過程也將在本文後面討論。

貳、政策面向的派系衝突

在毛死後到 1983 這段期間，政策面向的派系衝突大體又可分為兩個領域的政府來討論，第一個面向是經濟政策，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前，是華國鋒的洋躍進政策和陳雲的調整政策在對抗，是優先發展重工業抑或優先發展輕工業之爭；到十二大之後，則有陳雲的烏籠經濟和鄧小平的市場化改革之爭，當然鄧小平沒有站到第一線。這次的爭論則是經濟體制之爭，本章經濟危機一節已經討論了華國鋒和陳雲經濟政策的不同，在華國鋒下台、陳雲上台主導經濟後，並且將石油派的勢力清除後，經濟發展政策大致底定。而烏籠經濟和市場化改革之爭在 1983 後才白熱化，因此將在下一章進行討論。

而從政治領域來看，扮隨著權力鬥爭，在政治領域的政策衝突是更為激烈的，其中又可分為意識型態、解釋歷史權之爭，以及對民間不同意見者或不同意見團體如何處理之爭，在毛死後至 1983 年，四人幫的垮台是純粹動用軍警力量，較少在意識型態或解釋歷史權和其他各派有正面交鋒對決。

而在華國鋒和鄧小平之派系對決時，在意識型態及對歷史解釋上則進行了一場精彩的攻防。華國鋒作為文革受益者，他的統治正當性來自於毛的遺訓，所以他對毛的評價及文革的評價，除了不容置疑外，更要堅決擁護，華國鋒對文革的評價是正面的，且認為應該有機會必須再發起類似運動，對於文革中的錯誤，他的解釋是四人幫所造成。最後甚至於 1977 年 2 月提出了兩個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擁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的遵循」。

而鄧小平的因應策略，則是一開始先低調地承認華的領導，待其復出後，負責科教工作，以及解放老幹部的工作，在黨內慢慢取得控制權，在民間也因其開

放寬鬆政策獲得了民意支持。

但如何評毛的問題確實使鄧為難，若不否定毛，則無法否定文革，不否定文革，則無法重新恢復自己的統治正當性，因為鄧小平的錯誤是毛親自訂的；但若否定毛，則後座力可能會波及到整個中國共產黨的統治正當性，蘇聯可以評史達林，因為史達林之前還有列寧，但在中國大陸，毛同時扮演了列寧的史達林的角色，毛若被否定，則中共政權是否從一開始就是個錯，尤其當時中國大陸百姓對中共普遍存有信任危機，若評毛過程中稍有不慎，連中共的合法性都得陪葬。²¹

因此鄧小平在 1977 年 7 月復出之際，首先提出了「不能夠只從個別詞句來理解毛澤東思想，而必須從整個體系去獲得正確的理解」，²²雖然沒有直接的說「兩個凡是」的不是，但應該可以看出端倪；而於 1978 年 5 月，在胡耀邦等鄧系人馬的運作下，提出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²³正式地和凡是派對上，鄧小平巧妙地運用毛澤東在延安時代批評教條主義的方法來否定「兩個凡是」，強調「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在不挑戰毛的權威之下，找到反駁凡是派的理論基礎。

從 1978 年 5 月到 11 月底是「實踐派」和「凡是派」全面開戰的日子，大體是以看哪份報紙轉載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抑或是發表了支持的評論員文章，則表示該單位認同了「實踐派」的看法，也表示是支持鄧小平一派的，其中解放軍報於 6 月發表評論員文章，支持實踐論，²⁴甚為關鍵，而後各省、各軍區也紛紛表態，「凡是派」大勢已去。再加上鄧負責解放、平反的工作，在爭取群眾的支持上大有斬獲。加上對西單民主牆的有意縱容，讓人民抒發對文革、毛、四人幫的不滿，進而削弱華身為文革受益者的統治正當性，在此基礎下，十一屆三中全會中鄧小平發表講話，以「實事求是」作為該次會議主軸，²⁵會議

²¹ 費正清編，《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1949-1965)》，頁 408。

²² 鄧小平，《鄧小平文選(1975-1982)》(香港：三聯書局，1983)，頁 39-44。

²³ 凌志軍、馬立誠，《呼喊——當今中國的五種聲音》(台北：天下，1999)，頁 51-56。

²⁴ 吳江，「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最基本的原則」，解放軍報，1978 年 6 月 24 日，第 1 版。

²⁵ 鄧小平，「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歷史檔案》(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1998)，頁 554-566。

對「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作了高度評價，鄧小平取得大權。

而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後，華國鋒一派幾乎全數退出權力高層，經濟政策大體遵循陳雲「調整」的路線，沒有太大爭論，但在意識型態與對民間政治控制的議題上，則有不同意見之分，可以從幾個事件中來看出這兩派的態度與衝突在哪。

關於北京之春的處理方式，顯然是保守派取得了優勢，因為鄧小平是站在他們那邊的，尤其在鄧已經擊敗華國鋒派，北京之春已沒有利用價值，而民主牆在此時又將矛頭轉向中共及對鄧的批評，更令鄧下了決心鎮壓民主牆運動，結束了這段期間最大的民間政治動員。而鄧小平在此時提出「四個堅持」，「四個堅持」是保守派文膽胡喬木起草，無疑是對保守派給予很大的鼓舞，而中共黨內的改革派力量則是遭到打擊。

但同時，對華國鋒的批判，也在此時繼續，改革派雖然遭受打擊，但一個總體趨勢，是改革派的勢力與日俱增，進兩步退一步的在往前進。

另外，在 1981 年發生了白樺事件，白樺是文藝界人士，其作品「苦戀」被解放軍報批評，被認為是違反了四項基本原則，其矛頭不只對向文藝界，更是保守派對改革派在各個面權力擴大的不滿。而後，鄧小平甚至於親自發表談話，明白地指出「苦戀」違反四個堅持的核心——堅持黨的領導，是搞「資產階級自由化」。而所謂「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核心就是「反對黨的領導」。²⁶這談話不可謂不嚴厲，對改革派而言，又是一個打擊。

鄧小平忽而支持改革派，忽而發表「四個堅持」、「反資產階級自由化」等保守的談話，我們可以有兩種面向的解讀：第一，保守的談話，是鄧小平為了解決政經改革的阻力，安撫保守派的權宜之計；第二，則是鄧小平他本身對中國大陸的發展計劃，就是政治緊而經濟鬆，他支持經濟轉型，但不支持政治轉型，在政治領域，鄧小平從來不是個改革派。

本文基本上支持第二個論點，但在 1980 年代當時，大家普遍採第一種論點，

²⁶ 鄧小平，《鄧小平文選(1975-1982)》，頁 344-348。

也因此鄧小平在大陸民間的聲望仍然是持續上升的，可以說鄧小平的頭上是有「光環」的，對於經濟的成長，功勞會記在鄧小平的頭上，但對於抑止社會自由思潮的行為，無論大陸民間，或海外媒體，多會將這些作為算在保守派頭上，尤其是鄧力群、胡喬木等，常被做為攻擊的目標。但在我們站在事後的觀察，鄧似乎才是壓抑民間社會自由思潮的主導者。只是在這本章這段期間，鄧小平為了進行與華國鋒的權力鬥爭，必須在意識型態上取得主導權，才會在政治上採取較寬鬆的政策，但當民間社會的行為已超出他的控制時，鄧會毫不猶疑地採取保守的行動，或許鄧身旁保守派的意見有其影響力，但是鄧本人如何看待政治自由化的態度，才是鄧如何決策的關鍵所在。

第五節 小結：派系衝突與自由化的啟動

毛澤東死後，中共派系為爭奪權力發生了衝突，包括了第一階段華國鋒及老幹部與四人幫的派系衝突，及後來第二階段實踐派與凡是派的衝突。在這段期間內，華國鋒和四人幫的派系衝突，先是削弱了中共統治合法性，而實踐派與凡是派的派系衝突，由於實踐派對民主牆運動一開始的利用，開啟了自由化運動，影響了後來十年中國大陸的中國大陸政局。

壹、華國鋒和四人幫的派系衝突，削弱了中共統治合法性

在華國鋒和四人幫的派系衝突中，如何影響自由化啟動最重要的因素，是讓中國大陸人民對中共意識型態產生懷疑，因為大陸人民看到中共高層並不是團結的，威權政體一旦被人民得知他們內部是不團結的，其統治合法性就會削弱。尤其雙方都借重媒體作為鬥爭工具。

派系在動員時，要看那方勢力大，得看其動員能力或是其口號、文章在官方媒體出現的次數、篇幅大小，或是誰掌握重要會議的講話。²⁷因此這階段，和下一個階段實踐派與凡是派鬥爭階段的中共黨內派系衝突，透過媒體的傳送，密集地被攤在人民的眼前。

但這階段派系鬥爭最後以軍警力量解決，民間社會僅處於旁觀者的角色，沒有直接參與其中。

貳、實踐派與凡是派的派系衝突，開啟了自由化運動

但在鄧小平在與凡是派的鬥爭中，由於前一個階段或說自文革以來，共產黨

²⁷ Lucian W. Pye, *Asian Power and Politics : the Cultural Dimensions of Authority* (Cambridge, Mass.: Belknap Press, 1985), pp. 31-54.

統治合法性的不斷削弱，因而民間社會有了反應，自發性地開始有了民主牆運動，而由於其時空背景處於鄧小平與凡是派的派系衝突，鄧小平援引了社會力量，來支持他的論述，並且也達到他的效果。如同 Przeworski 所說，政權內的自由化者，看到了某些有待於組織起來的社會力量結盟的可能性，這表示，在市民社會裡確實有一定的力量可作為聯盟的對象。群眾內部也感受到政權內有分裂的跡象，政治空間有開放的可能，因此產生動員。²⁸

因為威權政體的自由化者，總是把自由化設想成是他們所能控制的，因此當北京之春的言論超越其忍受範圍內，且鄧小平已經在派系衝突中取得勝利，因此鄧毫不客氣地打壓北京之春，更何況鄧小平在政治領域上一直是個保守派，不屬於真正的自由化者，但對西單民主牆運動一開始因為要利用，所以容忍，但當民主牆運動有越演越烈的趨勢時，鄧小平馬上做了處理，避免其危及共產黨的執政合法性。

參、中共放鬆民間政治控制

不過隨著民主牆運動告一段落後，鄧小平開始把施政重心放在經濟改革以及四化之上，雖然總體經濟仍是授權陳雲負責，但包括開放外資進入中國、引進西方資金與技術、設立特區...等政策都體現了鄧小平的企圖心；在政治控制上，鄧小平是顯得老神在在的，他認為只要經濟的表現好，中共施政能讓人民滿意，基本上不用擔心合法性的問題，因此除了對文藝界或理論界，例如白樺，會主動點名批判，並且發起了「反自由化運動」進行控制之外。鄧小平對民間的控制實際上是放鬆的，漸漸不將政治控制當作建立統治合法性的工具；且民間社會對共產黨的恐懼也漸漸減退，「恐懼」不再是中共統治合法性來源。

²⁸ Adam Przeworski, 張光、馬俊峰譯,《民主與市場》(台北:桂冠,1998),頁72-73。

肆、鄧小平地位凌駕派系之上 以清除精神污染運動為例

並且當保守派氣焰太強，有危害到經濟改革的可能時，鄧小平會挺身出來講話，例如在 83 年的清除精神污染運動，是由鄧小平所發起，在一次講話中，認為理論界和文藝界的言論已經造成了「精神污染」。²⁹所謂精神污染可分為兩類，一類是宣傳人道主義、個人主義及社會主義異化之類的觀點；另一種則是宣揚資產階級生活方式。這兩類精神污染都對「黨、國家、民族」造成不好的影響。³⁰運動直接批判的是周揚與王若水。

由於得到鄧小平的支持，保守派當時擴大宣傳，清除污染運動聲勢頗為浩大，許多外商、外資都有撤離中國大陸的動作，害怕中國大陸反反覆覆的政治運動使其開放的經濟政策轉向，鄧小平也急忙做出回應，中共先宣布農村不提精神污染，又緊接著指出引進新科技不屬精神污染，然後在運動開始後一個月內就中止了此項運動。

從「清除精神污染運動」的忽然開始又在一個月內迅速結束，我們可以看出，鄧小平在擊敗凡是派之後已取得最高領袖的地位，保守派、改革派、老幹部，基本上都是團結在鄧小平之下，僅有以向鄧小平建言的權力來干預政策，但拍板權是掌握在鄧小平手中的。

並且隨著鄧小平掌權的時間越久，其地位越加穩固，其掌控人事及政策的能力也越來越強。

²⁹ 鄧小平，「黨在組織戰線和思想戰線上的迫切任務」，《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讀(下冊)》(北京：新華，1987)，頁 721。

³⁰ 朱穆之，「要採取措施清除文化界的精神污染」，人民日報，1983 年 10 月 24 日，第 3 版。